

科舉

天一閣博物館 編

與科舉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下冊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科舉

天一閣博物館 編

與科舉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下冊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計中式舉人一百名

第一名 陳詔

浙江青田縣人國

第二名 吳節

江西安福縣學生

第三名 范理

浙江天台縣學生

第四名 范宗

浙江諸暨縣人北京國子生

第五名 方熙

福建莆田縣人北京國子生

浙江青田縣人國子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一阁博物馆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458-0438-6

I. ①科… II. ①天… III. ①科举制度—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D6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5597 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李佳悒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张 懿

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册)
天一阁博物馆 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 000 mm 1/16
印 张 45.75
字 数 800,000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458-0438-6/D·16
定 价 98.00 元

目 录

科举与各类专门史(下)

《清代朱卷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

——以社会流动的考察为例	郑若玲	3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与近代尚武思潮的变迁	费志杰	15
论中国宗族钱会对科举平民入仕的作用	储建国	27
从军事角度透视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	黄明光	34
科举视角下的宋代皇帝	祖 慧	40
从宋到明科举考试用书的发展	[日本] 渡边健哉	55

地方科举、周边国家科举研究

清代两湖“南北分闱”再探	李 兵	71
科举考试与清代台湾社会	杨齐福	87
陕西历代进士数量及地域分布统计	郎 菁	97
嘉庆间鄞县童生罢考事件考	周慧惠	107
天一阁藏明清《进士履历便览》述略	袁 慧	114
明代河北进士分布解读	刘 虹	124
易代之际的科举制与政治社会生态		
——以明清鄞县科举望族为例	夏 柯	131
对于莫朝在升龙时间(1527—1592)的科举制度之初探	[越南] 阮友心	138

了解越南从十一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的儒学教育情况	[越南] 武维绵	151
-------------------------------	----------	-----

科举人物研究

杨慎在科举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张亚群 李 力	163
明代教官进士登科考论	陈长文	176
乡试考官林光与明代中期的副榜合格者	[日本] 三浦秀一	198
明代部分资料稀缺状元生卒年等辑考	周腊生	214
论公安三袁的科举观	王 炜	226
汤显祖的科举之路与文风	黄 卉	236
论黄宗羲对科举制度的检讨		
——兼论黄宗羲的教育思想	张宏敏	244
晚清台籍进士丘逢甲之研究	吴惠巧	252

科举文献研究

顾宪成乡试卷的学术价值	宋元强	263
民国稿本《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述略	乔丽娟 李占伦	274
明代进士登科录及相关问题研究	钱茂伟	278
台北故宫博物院科举档案简介	陈维新	292
论朱卷在明代科举文献中的价值		
——以《清代朱卷集成》为例	张 杰	299
明代化育科举的良方：《二业合一训》	邓洪波	310
天一阁《明代登科录》大型藏书之谜		
——兼论传入日本的《明代登科录》	[日本] 鹤成久章 陈翀 译	325
天一阁藏明代天台卢氏科举考卷、圣旨、家乘考论	王宏星	341
天一阁收藏明代科举文献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个人因素探究	施祖青	346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的开发及利用情况概述	谷 敏	357

科举与各类专门史（下）

《清代朱卷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

——以社会流动的考察为例

郑若玲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教授)

长存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相关文献。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科举学的兴起,作为科举学支流的科举文献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1]刘海峰教授认为科举文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即核心科举文献),如登科记、题名录、登科录、闾墨,以及一些专门记载或研究古代科举的著作、备考科举的书籍等;广义的科举文献则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散见于各种史书、方志、文集乃至文学作品中。^[2]朱卷便是核心科举文献的重要一分子。朱卷刊刻始于明代,到清代,刊刻之风已十分盛行,新中式的举人、进士都要将自己的试卷刻印以分送亲友,亲友在其开贺之日必还赠礼品以表祝贺。起初只有乡、会试才实行试卷朱笔誉录,后来各种考试中式刻印卷子皆采用类似形式。^[3]遗憾的是,作为科举学研究的重要文献,朱卷的现存数量相对于理论上应有的数量不及百一,其中,明代朱卷现存数量不详,清代朱卷现存的虽据估计至少在一万五千种以上,但也与理论上应有的数量相差甚远。所幸,上海图书馆数十年搜集不辍、集腋成裘,终蔚成一套由顾廷龙先生主编、上世纪90年代在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内容达四百二十册之巨、集朱卷八千余种,可谓是弥足珍贵的朱卷大集,为科举学尤其是清代科举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文拟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以《集成》功名获得者家世情况的统计结果来分析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为例,试析《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以求教于方家。

一、朱卷的研究价值

朱卷为科举考试的卷子,所载内容丰富详细,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考生履历,包括考生姓名、字号、排行、出生年月、籍贯、世居地、本族谱系、师承、同谊等。

其中,族谱简则明列祖妣三代,详则上自始祖、下至子女、旁及同族尊长、兄弟侄辈以及母系、妻系等无不载入,凡有科名、官阶、封典、著作等,皆一一注于名下,以显扬门庭之昌盛;师承则记录其受业师、问业师、受知师的姓名、字号及科名官阶,以示学问渊源有自。二是科份页,载有本科科份、考生中式名次、各类考官的姓氏、官阶和批语以及房官原荐批语等。三是考生文章,有三场全刊者,也有选刊自认为得意之作者。

朱卷因其信息记载详备且较真实可靠,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文献价值。关于朱卷的研究价值,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为学界所识。社会学家潘光旦与费孝通在其时运用朱卷进行过社会学的有关研究,认为朱卷履历部分的谱系与师承分别体现了作者的亲属源流与学业源流,而生物和社会的渊源并重,很合于现代遗传与教育并重的看法;谱系详载嫡系、同族、母系及其配偶等,则可追寻各家婚姻结合,推见各家生物性的关联;师承、同谊等记载,则可用于科举人物的思想、学术、政见的流传等。^[4]顾廷龙先生认为,朱卷的考生履历部分比官刻的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以及同年齿录等所载信息详细,不啻一部家谱的缩影,作为应考者的档案,其所反映的世系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较之家谱更为真实确切,成为研究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及宗族制度等不可或缺的文献。再者,大量举人、贡生甚至部分进士史传不登,即有所载,也无母系、妻系与师承传授的记述,而朱卷的履历则是不可多得的传记资料。此外,朱卷文章是研究八股文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这类实物,人们可形象地了解当时的考试形式、方法与考生的科场面貌以及科举取士的评判标准,并可从中窥视当时的教育状况等。^[5]

近20年来,伴随着朱卷文物的发掘、整理、流通与收藏,朱卷的文献价值得到进一步认可与开发,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朱卷来进行各领域的研究。如,高洪钧通过对李叔同父亲李世珍会试朱卷履历的考证分析,用大量的事实说明李叔同的祖籍是天津而不是浙江,浙江平湖只是其母亲的故乡,李叔同参加浙江乡试失败,是因为他冒籍平湖之故,从而破解了李叔同“平湖监生”之谜,订正了近人研究中的一些讹误。^[6]陈麟德、陈怡明在详细解读同治甲子科并补行戊午科一份江南乡试朱卷后,认为该卷既可补家谱、方志之不足,又为诗、文佳作汇编,熔史料性、文学性于一炉,对于存在了千余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可以尝鼎一脔,窥豹一斑,见其大略。^[7]张杰通过分析高鹗的会试朱卷履历,为富有争议的高鹗籍贯及生年问题找到了新答案^[8];通过朱卷研究科举世家及其影响、考证蒙古旗人的社会生活问题等^[9]。此外,何怀宏、台湾学者谢浩等也对朱卷的应试功能、对策文等进行了研究。^[10]

除朱卷外,各种科举录和传记材料(包括个人传记和各地方志所撰传记)等,也是研究科举学惯用的研究材料。相比而言,科举录因受篇幅所限记载较为简单,而传记性材料通常又存在一些漏洞或缺陷,如何炳棣所指出:一是缺乏传主的个人

家庭背景资料(除非其祖先是高官显贵或有特别的才能和贡献,才会有所记载);二是传记材料的选择通常带有偏见,传主的材料有可能被夸大或刻意隐瞒,或者受编者个人主观因素影响。^[11]而朱卷不仅所载家族史料详细具体,且由于使用场合的严肃性,信息的准确度较高,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朱卷及其研究因此越来越为史学界所青睐。

二、《清代朱卷集成》研究爬梳

《集成》出版后,迅速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成为科举学一个新的学术兴趣点,极大地丰富了科举学的研究文献。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不仅出现了一些以《集成》中朱卷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而且还出现了两本专门以《集成》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12],进一步凸显了《集成》的学术研究价值。

蒋金星的博士论文《〈清代朱卷集成〉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研究》,如其题目所示,将重心放在论证《集成》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上。作者认为,对《集成》的研究除了在家族方面取得较大成果外,其他领域还很少有人涉及,《集成》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亟待发掘的丰富的历史文献宝藏。论文首先利用朱卷的丰富内容,对清代科举的程序、时间、地点、内容等进行归纳与概述。其次,论证《集成》为人物传记资料的宝库,认为其既是清代登科人的第一手资料,又是历代登科人的间接资料,也是登科人的家族史资料,同时还是登科人的受知师、受业师及同窗好友等其他人物的传记资料。再次,通过登科人年龄特点的研究、《清史稿》进士及第时间的考订、高鹗生年及籍贯新考、朱卷履历中生年与官年的表达、考生姓名字号变化现象的分析等,论证朱卷所载人物传记资料的学术价值。又次,论证朱卷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认为朱卷履历记载了登科人及其祖先在他们活动时代经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此外,论文还通过朱卷的文章对八股文的范式及衡文标准进行例释,并对一些为人所熟悉但容易弄错的科举术语进行了考辨。^[13]

方芳的博士论文《〈清代朱卷集成〉研究——以清代进士履历档案为中心》,对《集成》中会试朱卷所涉及的六千多份进士履历^[14]进行考据、归纳、统计、总结。论文首先对进士履历的文献价值进行研究,从辑佚、补遗、校勘订正等方面论述朱卷履历对家谱、方志和碑传的补订作用,为编著《历代登科总录》提供丰富翔实的清代进士履历资料;此外,作者发现进士履历所记载的大量著述中有七百余种是《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所遗漏的,因而具有较高的补遗价值。其次,对进士履历的史学价值进行分析,认为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史料对历史事件尤其是历史人物研究具有补阙作用。再次,对进士履历的社会学价

值进行阐释,通过七百九十五个科举家族在全国的地理分布调查,分析文化型科举家族的地理分布,论述进士功名与仕宦的关系,阐述清代婚姻法对家族联姻的指导作用、姻亲对家族教育的重要作用。^{〔15〕}

除此两篇专题博士论文外,另有一些与《集成》有关的科举学研究成果。如,张杰的专著《清代科举家族》以《集成》中八千多份朱卷履历为基本史料,从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社会流动、地域变化、家族影响等多个视角研究清代科举家族。该书详细论证了经济条件在科举家族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将科举家族兴旺发达的原因归结于重视文化教育,充分肯定了科举家族的历史地位,填补了满族科举家族研究的空白,被誉为“一部拓荒性的学术著作”^{〔16〕}和“清代科举家族的百科全书”^{〔17〕},该书也充分肯定了《集成》的史料价值。董莲枝也认为《集成》尽收康熙至光绪朝有清一代科举考试的试卷题目、内容、传记档案等,对于研究清朝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谱牒学能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18〕}此外,夏剑钦、陈致、蒋金星、方芳等也都发表了利用《集成》史料而做出的相关研究成果。^{〔19〕}

具体到《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蒋金星的博士论文以《集成》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为题,却未专门论述社会学方面的文献价值,仅提到其为登科人家族史资料之宝库。方芳的博士论文虽以专章对进士履历的社会学价值进行阐释,涉及科举家族的地理分布、婚姻对科举的作用等问题,却遗漏了社会流动这一重要内容。张杰的专著也有“社会流动”专章,但由于其对象主要是科举家族的典型个案,范围难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余有关论文对于《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要么点到为止,要么根本未及。

三、科举对社会流动影响研究综述

社会流动作为考察社会动态结构变化以及衡量社会开放与发展的重要指标,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科举制度建立后,随着用人标准向“以文取人”的转变,统治阶层原有的单一封闭的社会成分结构开始受到冲击。尤其是宋代以后,科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日重,统治阶层社会成分结构也发生了前所未有之变化,并对其时的政治、教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科举与社会流动^{〔20〕}的关系,成为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研究的兴奋点。关于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古今中外已有不少定性或定量研究,大致归为三派,即流动派、非流动派和中间派。流动派认为科举促进了阶层的上下流动,以潘光旦和费孝通^{〔21〕}、柯睿格(E. A. Kracker)^{〔22〕}、何炳棣^{〔23〕}等人的研究影响较大。以海姆斯(Robert P. Hymes)^{〔24〕}、哈韦尔(Robert

A. Hartwell)^[25]和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26]等人为代表的非流动派,则认为科举并未造成多大的社会流动,甚至基本上不存在通过科举实现的向上流动。相比于流动派和非流动派,中间派的观点似乎更具弹性,他们一方面肯定科举改变了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认为其对社会流动的作用和影响非常有限,以张仲礼^[27]、贾志扬(John W. Chaffee)^[28]、李弘祺^[29]等人的观点较具代表性。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中间派的人数可能最众,而且观点多在流动与非流动之间徘徊。这三派观点之所以笔争不断,舌战不辍,固然受学术门脉和根基之影响,但所持史料的时代和地域之差异、样本之大小、研究方法之差别等因素的影响,恐亦不容小觑。这也许是“科举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和结果既没有流动派所说的那么大,也没有非流动派所说的那么小”^[30]等观点占主流的原因之一。

研究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最常用的方法是分析科第人物的家世出身,而家世出身的明显指征便是科举功名。在科举时代,功名对于普通民众所处阶层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即便是那些达官显贵家庭,也需借着功名维持乃至提升其家族地位,所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31]。因而,功名可以作为研究科举社会流动的一个突破口。而朱卷履历记载的举子家世及父祖各代功名情况,如前所述十分周详且较为准确可靠,因此成为研究科举与社会流动问题比较理想的史料。

就笔者视野所及,迄今为止,取朱卷为史料对科举与社会流动问题进行研究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潘光旦、费孝通的《科举与社会流动》和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两项。潘、费的研究以穷其所能收集到的九百十五份朱卷的履历为调查对象,将举子父祖五代功名情况分为上、中、下级和无功名四类进行统计分析。潘、费所界定的社会流动是举子从上五代父祖中没有获得任何功名的布衣家庭而得功名。经过层层筛选统计,得出五代之内均无功名者的比例为13.33%,认为这一比例便是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基本贡献率,并据此认为,科举并非完全由已有功名的世家垄断,虽然科举成为社会流动的渠道并不见得很宽大。潘、费研究因开先河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参考意义。但由于所用朱卷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了结论的说服力与研究的精细度(盖因样本较少,对进士、举人和贡生卷未作区分)。

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主要是通过分析《集成》朱卷的史料信息,对一些有典型意义的科举家族进行研究。该书第五章《社会流动》分别从“应试中的水平流动”、“中举者的垂流动”和“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等方面,对科举社会流动问题作了定性和定量研究。其中,所作的阶层垂流动主要根据陕西二十三份举人履历,来统计非科举家族实现整个家族垂流动(变成科举家族)所需时间。其研究重点是放在少而又少的科举家族而非普通家族上,因而没有大样本的调查统计。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则主要从清代顺天乡试外地考生与外地官员人数的对应关

系,来看科举对士人居住地的迁移影响。

四、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集成》的统计分析

出于对“科举到底引起了多大的社会流动”这一“公案”的好奇,受潘、费研究的启发,加之《集成》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笔者选取了《集成》中各级功名获得者的朱卷履历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朱卷作者的家世调查,得出自己的看法。^[32]在剔除《集成》全部朱卷八千三百六十四份中仅存文章的无效残卷后,本研究共得有效卷七千七百九十一份,其中,会试卷为一千五百六十八份,乡试卷为四千八百六十九份,贡生卷为一千三百五十四份。举子家世(即所处阶层)以功名为据,将之分为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其他和无功名^[33]共计六类,从各级考试朱卷作者的祖上功名、姻亲和母系功名两个维度来看科举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对科举促进社会流动的估算结果,与统计口径有密切关系。潘、费研究中仅将功名分为上、中、下级和无功名四类,“无功名”范围较宽,包含了“其他”类,笔者的统计口径则将这二者做了区分。与此同时,笔者也采用潘、费的口径,试图通过不同口径统计结果的比照,对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作出更全面的估算。

(一) 祖上功名

笔者先依自己的统计口径(“无功名”与“其他”分别统计),得出各层举子上行五代均无功名的比例,进士、举人、贡生分别为 5.36%、6.72%、4.73%,平均为 6.10%,说明出身于上五代均无功名家庭的举子要想实现向上流动是相当艰难的。6.10%这一依笔者口径统计而得的科举对社会流动的贡献比率不到潘、费所得 13.33%的一半,概因统计口径的宽严不一所致。

潘、费取举子上五代计算可能过于苛严,也不一定符合家族发展的实际情况。^[34]笔者认为统计上三代功名便足以反映阶层的流动情况。事实上,除潘、费研究外,其余的定量研究基本上都是以三代为据的。对于普通家族而言,家道中落的情况多数时候甚至发生在一两代之内。对出身于上两代均无功名家庭而考取功名者,视之实现了阶层流动亦无可。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又依潘、费的统计口径^[35],分别统计了各层举子上行二代、三代和五代均无功名者的比例。

统计表明,上五代均无功名者,进士、举人、贡生的比例分别为 10.65%、10.68%、7.31%,平均为 10.09%;上三代均无功名者,进士、举人、贡生的比例分别为 13.27%、13.41%、9.45%,平均为 12.69%。笔者认为,这一 12.69%的上三代均无功名者的比例,可以认为是清代科举开放给平民上升的道路宽度,或者说是

科举在社会流动上所产生的力量或贡献。考虑到举子们在记录家世时可能牵强附会或夸大事实,这一比例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确信的最小值,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实际贡献很可能高于这一比例。上两代均无功名者,进士、举人和贡生的比例则分别为17.22%、17.66%和13.07%,平均为16.78%,说明有近17%来自父祖均无功名的布衣家庭的举子实现了阶层的向上流动。

若按社会阶层流动的定义,只要举子自身获得的功名高于其父祖辈的功名,例如,只要举人和贡生是来自父祖为生员或无功名之家庭,便可视为实现了向上流动,进士则更如此。事实上,生员阶层因经济地位低微,也可将其划归于一般平民(何炳棣的研究便如此划分)。这样的统计口径虽然可能稍嫌宽泛,但作为参照还是有其意义的。本研究的统计表明,若仅计父亲一代,所有举子中有44.51%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若以父祖两代计,有27.66%的举子实现了向上流动;若以上三代计,也有20.84%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其中,对进士而言,本文只统计了其出身于生员及以下家庭的人数,若将出身于举贡家庭的人员计入,则实现向上流动的举子比例会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基于何种口径来统计,出身于布衣家庭的各层举子中,贡生的比例始终是最底的。一般认为,功名越高,所需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源越多,布衣家庭在这些资源的占有上显然处于弱势,因而平民子弟考中功名的概率与功名大小理应成反比。由此推之,出身于布衣家庭的举子应以进士最少,贡生最多。但笔者的统计却与这一推论恰恰相反。原因何在?是否可以归因于贡生的家庭背景?贡生是从生员中经考试选拔优秀者贡入国子监者,但这种由学政主持的选拔考试远不及政府组织的乡、会试严格,人为因素的侵扰可能更多。再者,有些贡生头衔可以通过捐纳而得。如此,获得贡生资格所需的各种资源反倒可能较进士、举人为多,来自较高阶层的贡生自然也多于后者,来自较低阶层者则相应地少于后者。

(二) 姻亲和母系功名

为探究姻亲和母系因素对阶层变动的影响,笔者统计了所有举子岳父和外祖父的功名情况,得出岳父为布衣的进士、举人和贡生比例分别为43.88%、45.27%和39.00%,平均为四成左右;外祖父为布衣之进士和举人比例都超过了一半,分别为53.13%和51.80%,贡生依然最少,但也几近一半,为45.72%。为进一步探究姻亲和母系对布衣家庭出身举子功名之影响,笔者还专门统计了上三代均无功名的举子之岳父和外祖父功名情况。结果显示,出身于上三代均无功名家庭的各层举子中,岳父亦无功名者的比例相当高,进士、举人、贡生分别为71.63%、71.06%、68.75%;从母系家世看,出身于上三代均无功名之进士、举人、贡生,其外

祖父亦无功名者的比例分别为 86.06%、83.46%、84.38%。以上各项若将生员视为平民而计入,则岳父和外祖父之平民比例会更高。

关于举子祖上、姻亲与母系的功名统计结果可以支持以下两点结论:

其一,科举是促进清代社会流动一条公平且重要的渠道。虽然出身于上五代均无功名家庭的举子想要实现向上流动相当艰难,但对这些几乎没有其他社会资源的底层而言,科举却是他们唯一的升迁途径。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着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条较为公平的上升渠道。在科举制度已然腐败、售官数额越来越大的晚清,仍能有超过二成的上三代均为平民(含生员阶层)的子弟实现了家族和自身的向上流动,说明科举的大门的确是向各阶层普遍开放的。科举使社会阶层得以“洗牌”,在使门第力量日渐式微的同时,让真正的人才出人头地,而不论其出身于草根阶层抑或上流社会。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显然无法忽视和否认科举的公平性及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这一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柯睿格和何炳棣等流动派的观点。

其二,姻亲和母系家族对于举子提升社会阶层几无助力。非流动派针对流动派的主要攻击之一,便是认为后者没有考虑婚姻关系和母系家族对举子升迁的作用。^[36]而本研究的统计结果是出身于上三代均无功名之布衣家庭举子中,七成以上的岳父和八成以上的外祖父亦为布衣。这么高的比例除验证了古代联姻讲求“门当户对”外,也说明借助姻亲或母系家族力量实现阶层升迁的举子人数非常少,出身于布衣家庭的大部分举子并没有可以襄助的外在力量,主要还是靠竞争机会的开放和自身努力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因此,笔者不敢苟同非流动派将姻亲和母系等家族力量加以泛化的解释,并认为海姆斯和哈韦尔等人所持“财政官僚机构乃至整个政府都被一小群贵胄世族所统治,没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向上流动完全是由于在文官考试中取得了成功,相反,登科都是发生在跟一个已经形成的权贵缙绅世族通婚之后”^[37]的观点过于片面和偏激。

五、结语

以上关于举子家世粗略的量化统计,可以作为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集成》对于研究科举与社会流动关系的学术价值。事实上,《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远不止于此。量化统计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一个侧面,远不能反映科举社会结构变化的复杂过程。例如,何炳棣曾举例说,社会地位的提升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有的举子与其父辈处于同一阶层,表面上看并未发生向上流动,但实际上,其祖父以上各代可能世代为白衣;或者,有的举子曾祖父及其以上先祖可能身据要位,

但后来家道中落,直到该举子重获功名恢复其家族的社会地位。这些家庭内部似无阶层变动,但实际上发生了明显的阶层提升。这一复杂的过程用一个简单的数据显然是无法完全诠释的。^[38]换言之,这种变化过程难以在量化统计中明显体现出来,一定要通过对家族谱牒个案的定性分析,方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集成》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史料可供考证。再如,《集成》中有关族谱、师承与同谊等记载,可用于研究科举时代的区域流动、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乃至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等;履历中有关母系与姻亲的记载,可用于研究其时的婚姻制度与家族互动;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情况,可以归纳与总结科举时代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与规律。总之,《集成》中的履历、科份与文章信息,均可用于与社会学有关的考据或义理研究。

刘海峰认为,科举学是一座少有的“学术富矿”。科举学已有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影响、资料的宏富程度相比还很不相称。在涉及中国人文历史的学问中,很少有像科举这样地位重要、文献众多、价值甚高却尚未被充分研究的部分。科举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进行多学科的、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比较的科举研究,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创意。^[39]《集成》相比于其他同类文献也可谓是科举学研究的一座“富矿”。尽管基于《集成》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渐趋增多,但相对于其丰富的内容而言,与其相关的科举学研究成果仍非常贫乏,其所蕴藏的各方面史料还亟待大力开发与利用,有着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可供驰骋。历史地理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谱牒学、教育学、人口学、民俗学、文献学、民族学乃至伦理学以及这些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等,都可从《集成》中寻找新的“学术矿藏”,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只不过是其中一株“才露尖尖角”之“小荷”。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高考改革与入学机会公平研究”(08JJD880246);2007年度“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注 释:

- [1] 刘海峰在《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一科举学的奠基之作中,著有“科举文献论”专章,对题名录、登科录、朱卷、闱墨、试卷及其他科举文献作了介绍,论述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分析科举文献对于科举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又另撰《科举文献与“科举学”》(载《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一文,对科举文献与科举学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全面的阐述;陈长文博士的《明代科举文献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更为研究“明代科举文献”的专著,内容包括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原始性与权威性、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与其他版本之比较、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及其局限性、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订补问题等;郭培贵在《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

研究述评》(载《中国文化研究》2007 年秋之卷)中,也专门梳理了明代科举文献及其资料的研究,介绍了李大东、骆兆平、沈登苗、钱茂伟、周绍良、陈长文、吴宣德、鹤成久章等一批中外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在科举文献的整理、出版和资料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 [2]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42 页。
- [3]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序),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 年。
- [4] 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1947 年第 1 期。
- [5]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序),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 年。
- [6] 《从李世珍会试朱卷的发现谈起——破解李叔同“平湖监生”之谜》,《嘉兴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
- [7] 陈麟德、陈怡明:《“江南乡试朱卷——同治甲子科并补行戊午科”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学术版。
- [8] 张杰:《新发现高鄂会试履历中的籍贯与生年》,《清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 [9] 张杰:《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的科举进士家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 年第 3 期;《清代科举家族的人文环境述论》,《辽宁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教育——以北方地区为例》,《中国文化研究》2002 年秋之卷;《清代尚贤朱卷所见蒙古旗人的社会生活》,《清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
- [10] 详见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50—351 页。
- [11]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 1911[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95 - 97, 1962.
- [12] 两篇博士论文均来自浙江大学古籍所,指导教师为龚延明教授。
- [13] 蒋金星:《〈清代朱卷集成〉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研究》,浙江大学 2004 届博士论文。
- [14] 《集成》所囊括的进士共近 12 000 人,作者将重复的合并后,共得 6 383 位进士,占清代进士总数 26 747 位的近四分之一,并将其中的履历分为进士本人的、家族亲戚的和师友的三部分。
- [15] 方芳:《〈清代朱卷集成〉研究——以清代进士履历档案为中心》,浙江大学 2006 届博士论文。
- [16]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戴逸序。
- [17] 阎光亮:《清代科举家族的百科全书》,《社会科学辑刊》2005 年第 1 期。
- [18] 董莲枝:《〈清代朱卷集成〉的文献价值》,《辽宁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 [19] 夏剑钦:《〈清代朱卷集成〉中的魏源档案文献》,《船山学刊》2004 年第 3 期;陈致:《从刘显曾、刘师苍朱卷看仪征刘氏的先世、科举与学术》,《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蒋金星、蒋文轩:《清代湘籍状元的朱卷履历》,《船山学刊》2006 年第 4 期;蒋金星:《清代朱卷履历中举子的姓名研究》,《求索》2006 年第 12 期;方芳:《清代科举家族地理分布的特点及原因》,《济南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 [20] 社会流动从流向上可分为横向流动与纵向流动。本文所涉主要指社会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个别地方指地域之间的横向流动。